

廣州光孝寺二鐵塔的建造性質

古正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大乘佛教自1世紀出現於印度西北之後，即提出佛教的治國思想及方法。初期大乘佛教所提出的佛教治國思想及方法，後來便成為大乘佛教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公元2到3世紀之間，在南印度提倡大乘信仰的有名大乘思想家龍樹／龍猛菩薩（Nāgārjuna），在其論作《寶行王正論》（the Ratnāvalī），也提出相當具體的佛教建國策略。龍樹的佛教建國策略，包括有社會政策、教育政策及宗教政策。龍樹談論最多的就是其宗教政策。在其宗教政策中，龍樹不斷的提到要建立支提（caitya）及崇拜支提。¹龍樹所提出的支提信仰，很顯然地被當時統治印度德干高原（the Deccan Plateau）的娑多婆訶王（King Sātavāha/Sātavāhana）作為其佛教建國信仰或國教（state religion）。²現在我們在印度東南沿岸的安達羅省（Āndhra Pradesh），尚能見到娑多婆訶王為提倡支提信仰所建造的阿瑪拉瓦底大支提（the Mahācaitya of Amarāvati）的遺址及造像。

龍樹的支提信仰也被稱為「彌勒佛下生為轉輪王」的信仰。支提信仰之所以也被稱為「彌勒佛下生為轉輪王」的信仰，乃因《證明經》如此記載彌勒佛／菩薩由兜率天坐「雀梨浮圖」下生的信仰：「吾下之時，或兜率天上雀梨浮圖，或從空而下。」³義淨（653-713）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那爛陀（Nālandā）的佛跡時，提到「雀梨浮圖」與「支提」乃是同樣的建築物：「次此西南有小制底（支提），高一丈，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梨浮圖，此即是也。」⁴由此，支提可以被造成「浮圖」或「塔」（stūpa）的建築型式，但支提與塔的功用卻不相同。因為除了龍樹自己說：「支提聖尊人／供養恆親侍」，⁵即支提造有「聖尊人」被供養外，唐代（618-907）釋道世編撰的《法苑珠林》對支提與塔的區別也作

有這樣的說明：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養。⁶由此，支提因安有佛像，故與收藏舍利的塔的性質不同。由此，我們也知道，支提信仰就是崇拜彌勒佛／菩薩坐支提自兜率天上下生為轉輪王的信仰。所謂「轉輪王」（cakravartin），就是指用佛教信仰治國，或龍樹所言的「正法治化」（dharma rule）⁷的帝王。

龍樹的支提信仰除了被載於其自己的作品外，也被登錄於後來制作的許多大乘經典。譬如，被收入於《大正藏》第八十五冊「敦煌遺書」的《普賢菩薩說證明經》（此後，證明經），⁸及被收入於《華嚴經》的《入法界品》，都是例子。支提信仰後來不僅成為印度的重要政治信仰，其也被傳入亞洲各地成為亞洲許多帝王的重要治國術（rulership）。中國早在石勒（319-333）及石虎（334-349）統治中國北方的時代即已傳入此信仰。⁹中國佛教文獻及史料常稱中國使用支提信仰的帝王為「天王」。譬如，《釋氏稽古略》載：「晉咸和五年，（石）勒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¹⁰又如：「（苻）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¹¹中國佛教文獻及史料之所以稱使用支提信仰為王的帝王為「天王」，乃因這類帝王被視為彌勒佛／菩薩從兜率天（the Tusita heaven）坐支提下來出生（下生）的轉輪王。中國用「天王」稱號建國的帝王很多，一直到唐高宗李治（649-683）統治唐代的時間，我們還見其用「天皇」稱號稱呼自己。¹²

支提信仰可以說是一種佛教教化（inculcation）信仰，但其更是一種對帝王形象（image）崇拜的信仰。早期使用支提信仰的帝王都用「彌勒佛」（Buddha Maitreya）或「彌勒佛王」（Buddharāja Maitreya）的面貌統治世間。使

用支提信仰統治世間的帝王/轉輪王之所以也被稱為「彌勒佛王」，與這種帝王同時以彌勒佛身及轉輪王身統治世間的形象有密切的關聯。《證明經》載：「天出明王，地出聖主，二聖並治並在神州」。¹³ 此段話的意思是，彌勒（明王）由天上下生，轉輪聖王（聖主）則在地上出生，兩者同時統治神州。最後這句話並不是要說，彌勒與轉輪王是不同的兩人；而是要說，同一人用兩種身份統治神州。武則天在其提倡支提信仰之際流通天下的《大雲經疏》，即用此段話說明其既是彌勒佛下生，又是轉輪王出世的彌勒佛王。¹⁴

支提信仰在亞洲歷史上發展的時間很長，因此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有被密教化的現象。密教化之後的彌勒佛王，常以「彌勒菩薩」（Bodhisattva Maitreya）或「盧舍那佛/毗盧遮那佛」（Buddha Vairocana）的面貌統治世間。《入法界品》更用彌勒佛、盧舍那佛及釋迦佛等佛都由同一「佛母」出生的緣故而說其等有身份重疊的信仰。¹⁵ 這種「一佛多身」的信仰，也見記於《證明經》。《證明經》載：「我本根元，或是定光佛身，或是句樓秦佛身，或是無光王佛身……或是釋迦身。我本菩薩時，名為阿逸多，釋迦涅槃後，先作法王治，卻後三十年，彌勒正身下。」¹⁶ 由於有「一佛多身」的信仰，帝王在施行支提信仰之際，或常以盧舍那佛/毗盧遮那佛的面貌取代彌勒佛/彌勒菩薩的面貌，或同時以盧舍那佛和彌勒佛的面貌作為其「天王」的面貌。

亞洲在發展支提信仰的過程中，遺留下許多有名的支提信仰遺址及造像。譬如，娑多婆訶王在其都城建造的阿瑪拉瓦底大支提、¹⁷ 5世紀後半期統治西印度的哇卡塔卡王（King Vakataka）哈利先那（Harishena, 460-478），於今日西印度摩訶斯特拉省（Mahārashtra）開鑿的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¹⁸ 7世紀初期開始開鑿的葉羅拉佛教石窟（Ellora caves）、¹⁹ 8到9世紀間印尼山帝王朝（the Śailendra）在中爪哇建造的波羅波多遺址（Candi Borobudur），²⁰ 及中國北魏時期（386-534）在今日山西大同開鑿的雲崗石窟²¹等，都是亞洲有名的支提信仰遺址。

唐高宗李治在統治唐代的時期，也有發展

支提信仰的活動。李治在發展此信仰的時期，不但在上元元年（674）「改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²² 在高宗去皇帝號改為「天皇」的前一年，即咸亨四年（673），僧人釋慧簡即為高宗在洛陽龍門石窟的「慧簡洞」造了一尊倚坐（pralambapādasana）的彌勒佛王像（圖1）。²³ 咸亨三年（672）釋惠暎（慧（惠）簡）等僧人又在龍門奉先寺為高宗造了一尊「盧舍那佛像」（圖2）。²⁴ 這說明高宗在發展支提信仰之際，有同時使用彌勒佛王及盧舍那佛王下生形象統治唐室的現象。

武則天在建立大周（690-705）的初期，也沿襲唐高宗此支提信仰治世。武氏時代的造像者，在武氏施行支提信仰治國之初，在今日龍門擂鼓臺中洞正壁便造有一尊武氏呈倚坐的彌勒佛王像（圖3）。²⁵ 事實上武則天在發展支提信仰時期所造的彌勒佛王像，主要都造成倚坐的坐姿。譬如，武氏延載二年或證聖元年（695）禪師靈隱共居士陰祖等於敦煌為其造的一尊高140尺的「北大象」，也是一尊呈倚坐的巨型彌勒佛王造像。²⁶ 又，長安三年（703）為武則天的「七寶臺行道儀式」所造的一類具有造像銘記的彌勒像，也都造成倚坐的坐像。²⁷ 武則天以彌勒佛下生為女轉輪王的形象，也登錄於其登位第一年（690）流通天下的《大雲經疏》。《資治通鑑》載：「東魏國寺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²⁸ 此處所言的「大雲經」，乃指《大雲經疏》。同年，武則天更因「盧舍那」或「毗盧遮那」之名有「太陽遍照」之意，從而使用當時新創的「嬰」（照）字為名，²⁹ 說明其也以「盧舍那佛」的面貌統治天下。³⁰

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彌勒佛王或毗盧遮那佛王的信仰及造像傳統，也見於10世紀初於廣州建都的南漢王朝（917-971）所建造的東、西二鐵塔。南漢時代所制作的東、西二鐵塔，乃是南漢王劉鋹（958-971）時代的建造物，目前此二鐵塔都保存在廣州光孝寺內。西鐵塔位於光孝寺大殿後西側，原來七層的塔身現在只剩四層（圖4）。同為七層的東鐵塔（圖5），收藏在同

寺一庫房內，保存相當完整。劉銀時代的光孝寺叫做「興王寺」，³¹很顯然的是座國家或皇家寺院。有關西鐵塔的建造型制及造像，《西塔銘》有清楚的記載：

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
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
三十三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壬
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³²

大寶六年（963），是南漢王劉銀登位的第六年。從《西塔銘》所記的龔澄樞冗長官銜可以看出，造此西鐵塔的龔澄樞是劉銀非常倚重的一位宮內太監。事實上龔澄樞就是南漢當時的真正「決策者」。《通鑿輯覽》（五季戊午）載：「南漢主晟殂，子銀立，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宦者知承宣院）、盧瓊仙（女侍中）等，臺省備位而已。」³³由此，當時建塔或發展佛教的活動，非常可能就是龔澄樞所作的決策。《南漢春秋宦官列傳》說：「龔澄樞廣州南海人也」。³⁴龔澄樞所建的西鐵塔，很清楚的反映此鐵塔的信仰及造像內容，與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支提信仰內容非常相仿。換言之，鐵塔的信仰及造像內容都說明，劉銀在登位的第六年有發展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活動。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引李文藻素伯之言如此記載西鐵塔之形制及造像內容：

素伯又為文記塔之形制云：塔自石趺以上高丈有九尺六寸。石趺四重，刻獅獸。鐵趺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三珠，縮其地廉外為四人首戴。第三重如晶口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各闊四尺六寸，為瓣九。中瓣刻紋於上，自蓮花瓣以上凡七層，以次而狹，皆鑄佛像，最上闊不過二尺，又上為蓮花頂。每層大佛一眾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則千佛矣。下二層佛旁有字，梯而視之，第一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

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之功德佛，其造塔自沉乎？第二層東盧遮那佛、南盧舍那佛、西摩尼佛、北毗舍浮佛。他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右。塔頂似有字，勢甚危不可梯也。³⁵

李文藻認為，「塔頂似有字」，但引李文藻之文的幼川撰《光孝寺鐵塔考》又引《廣東通志》說：「塔頂為蓮花形，無字，李文藻之言，肌說也。」³⁶由李文藻在上面對光孝寺西鐵塔所作的描述，我們知道西塔的造像內容有「彌勒像」及兩尊盧舍那佛像：「盧遮那佛」及「盧舍那佛」。所謂「彌勒佛」，就是指塔上呈倚坐的「彌勒佛王像」（圖6），而「盧遮那佛」及「盧舍那佛」，應都指「盧舍那佛像」或「毗盧遮那佛像」。此二像中的一尊，很明顯的結密教大日如來（盧舍那/毗盧遮那）印，即右手拳握在胸前豎起的左手食指手印（mudrā）（圖7）。

塔上的其他造像，如釋迦像、彌陀像及藥師像等，也都與支提信仰的內容有關。《證明經》在談論「一佛多身」的場合便提到彌勒與釋迦有同身的關係。《證明經》在經尾更如此提到此彌勒佛王的信仰與「無量壽」（Amitāyus）的關係：「彌勒治化時，人受（壽）八萬七千歲。自欲受終時，不勉自然生。復欲受終時，託生無量壽，自然蓮花生。」³⁷這話的意思是，相信彌勒佛王下生「治化」的人，死後都會往生阿彌陀佛或無量壽佛的世界。

敦煌莫高窟初唐時期開鑿的彌勒窟，也見有石窟南、北壁各畫倚坐彌勒佛王像及「阿彌陀經變圖」的布局。這些倚坐彌勒佛王像，都畫在所謂的「彌勒經變圖」中。譬如，莫322窟、莫329窟（圖8）、莫331窟及莫341窟等都在其石窟的南、北壁畫有此二佛的經變圖。³⁸敦煌石窟將「阿彌陀經變圖」與倚坐彌勒佛王像同時呈現於同一石窟的做法，就是要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與阿彌陀的信仰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敦煌的彌勒窟沒有將倚坐的彌勒佛王像畫在南、北壁，則見有石窟的南壁畫「阿彌陀經變圖」，而北壁畫「藥師經變圖」的情形。譬如，初唐開鑿的莫220窟，

在其甬道南龕內西壁畫有一鋪倚坐的「彌勒說法圖」。³⁹石窟的南壁畫「阿彌陀經變圖」，而北壁則畫「藥師經變圖」，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也與藥師佛信仰有關。初唐的「藥師經變圖」也出現在初唐開鑿的莫332窟。此窟在「中心方柱東向面塑一佛二菩薩立像一鋪，上畫文殊、普賢各一鋪。南向面畫盧舍那佛一鋪、西向面畫藥師佛一鋪，北向面畫靈鷲山說法像一鋪。」⁴⁰由此中心方柱的造像也畫有《入法界品》最重要的兩位菩薩，即文殊及普賢，我們非常確定，此窟的造像內容也是要說明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從敦煌初唐石窟常造彌勒佛王像或盧舍那佛王像的情形來判斷，敦煌石窟此時期造彌勒佛王像及盧舍那佛王像的活動，與初唐時代唐高宗及武則天發展彌勒佛王／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活動乃息息相關。

西鐵塔是座四方形底寬上窄的七層鐵鑄方塔。塔的四面中央，每層都造有一尊較大型的佛像，大佛像四面又造有許多小佛像圍繞。「彌勒佛」及「盧遮那佛」和「盧舍那佛」等的造像，都屬此塔四面中央所造的較大型佛像。顯然的，鐵塔四面中央所造的較大型佛像，乃是此塔要表達的主要信仰內容。從此西鐵塔造有兩尊盧舍那佛像，即「盧遮那佛」和「盧舍那佛」，的情形來判斷，此塔有特別側重盧舍那佛信仰的現象，因此在同一塔內制作兩次／尊盧舍那佛的造像。由於此鐵塔的「彌勒像」被造成傳統用以表達彌勒佛王造像的倚坐坐姿，我們因此非常確定，此鐵塔乃是一座要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鐵塔。特別是，西塔的主要造像內容，很明顯的承襲了初唐以來在敦煌常見的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造像內容。

光孝寺東鐵塔的建造年代比西塔晚四年，乃建於大寶十年（967），是由南漢當時的皇帝劉鋹自己出資建造的一座與西鐵塔形制相仿的鐵塔。⁴¹幼川在其《光孝寺鐵塔考》如此轉載《東塔銘》：

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並相輪。蓮花

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宮有慶，祈鳳歷無疆，咸使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 謹記。⁴²

東鐵塔很明顯的是南漢官方「敕有司」鑄造的一座類似西鐵塔的方形鐵塔，因為《光孝寺鐵塔考》所載的《東塔題銜》記有：「上將軍行內□□□□□□開國伯」、「教中大法師」及「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等帝賜名銜。⁴³東鐵塔的較大型造像也造有倚坐彌勒佛王像。這說明東、西鐵塔要表達的南漢佛教信仰內容相當一致，都是要發展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內容。從東、西兩鐵塔的造像內容來判斷，劉鋹應該在其登位的第六年，即大寶六年，便開始有發展佛教彌勒佛王下生信仰，以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的面貌統治南漢。此東、西二鐵塔，因此可以說是目前存世，且能說明劉鋹時代發展佛教信仰性質及內容的最重要證物。由於此二塔面都造有彌勒佛及盧舍那佛等的佛像，此二鐵塔因此可以說是南漢時代發展支提信仰所造的二鐵造支提。⁴⁴

註釋

- ¹ 陳代天竺三藏真諦譯，《寶行王正論》，《大正》卷32，頁493中-505上。
- ² 有關龍樹奠立支提信仰及支提信仰成為娑婆訶王朝國教之事，請見Kathy Cheng Mei Ku（古正美），“Nāgārjuna’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Early Buddhist Art in Āndhra Pradesh,” in K J Somaiya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ed., *Buddhist Culture in Asia: Unity in Diversity* (forthcoming)。
- ³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大正》卷85，頁1367中。
- ⁴ 唐三藏法師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2，《大正》卷51，頁6中。
- ⁵ 陳代天竺三藏真諦譯，《寶行王正論》，頁497中。
- ⁶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大正》卷53，頁580中。

- ⁷ 陳代真諦譯，《寶行王正論》，頁496上-中。
- ⁸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頁1362下-1368上。
- ⁹ 見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第二章，《東南亞的天王傳統與後趙石虎時代的天王傳統》（臺北：商周出版社，2003），頁77-98。
- ¹⁰ 烏程職里寶相比丘釋覺岸寶洲再編治集，《釋氏稽古略》卷2，《大正》卷49，頁780-781。
- ¹¹ 烏程職里寶相比丘釋覺岸寶洲再編治集，《釋氏稽古略》卷2，《大正》卷49，頁784。
- ¹² 見後詳述。
- ¹³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頁1366上。
- ¹⁴ 見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Seminario di Studi Asiatici, 1976), Plate II and Plate III; 並見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第五章，《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頁240-249。
- ¹⁵ 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卷70，《大正》卷10，頁379下-382中。
- ¹⁶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頁1362下。
- ¹⁷ Kathy Cheng Mei Ku, "Nāgārjuna'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Early Buddhist Art in Āndhra Pradesh," in K J Somaiya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ed., *Buddhist Culture in Asia: Unity in Diversity* (forthcoming)。
- ¹⁸ Walter Spink, *Ajanta to Ellora* (Bombay: Marg Publication, 1969), pp.23-24.
- ¹⁹ Walter Spink, *Ajanta to Ellora*, p. 63.
- ²⁰ Kathy Cheng Mei Ku, "Bodhisattva Samantabhadra of the Verification Sutra in Candi Borobudur" i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d., *Buddhism Across Asia: Networks of Material,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forthcoming).
- ²¹ 見古正美，《從〈大慈如來告疏〉說起——北魏孝文帝的雲岡彌勒佛王造像》，雲岡石窟研究院編，《2005年雲岡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7-40。
- ²²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鑒》下冊，《唐紀》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368上。
- ²³ 宮大中，《龍門石窟藝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172，「慧簡造像記」；並見溫玉成，「龍門石窟排年·雙窟與惠簡洞」，龍門文物保管所及北京大學考古系，《龍門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88-189。
- ²⁴ 劉景龍、李玉昆主編，《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河南：中國人民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下卷，頁379-38，見唐開元十年（722）造「大盧舍那像龕記」；並見溫玉成，「龍門石窟排年·奉先寺」，頁189-190。
- ²⁵ 見溫玉成，「龍門石窟排年·大萬伍仟佛龕」，頁205-206。
- ²⁶ 見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265。
- ²⁷ 見顏娟英，《武則天與長安七寶臺石雕佛相》，《藝術學》第一期（1987）文後附錄。
- ²⁸ 《資治通鑒》下冊，《唐紀》20，頁1377中。
- ²⁹ 同上，頁1376下。
- ³⁰ 有關武則天使用彌勒佛王及盧舍那佛王形象治國的活動，見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第五章，《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頁233-256。
- ³¹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謝任公編，《南華公論》（廣州：南華公論出版社，1940），頁7。
- ³²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謝任公編，《南華公論》，頁10-11。
- ³³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謝任公編，《南華公論》，頁10-11。
- ³⁴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謝任公編，《南華公論》，頁2。
- ³⁵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謝任公編，《南華公論》，頁4。
- ³⁶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謝任公編，《南華公論》，頁9。
- ³⁷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謝任公編，《南華

公論》，頁9。

³⁸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頁1368上。

³⁹ 並見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132，第322窟；頁134，第329窟；頁135，第331窟；頁140，第341窟。

⁴⁰ 羅華慶，《敦煌石窟·尊像畫卷》2（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頁79，圖像68；並見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頁87，第

220窟。

⁴¹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內容總錄》，頁136，第332窟。

⁴²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頁10。

⁴³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頁10。

⁴⁴ 幼川，《光孝寺鐵塔考》，頁10。

⁴⁵ 這篇短文能順利完成，筆者要特別感謝廣州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沈麟及唐鶴語兩位同學在百忙之中幫我找光孝寺的資料。

圖1、龍門惠簡洞唐高宗倚坐彌勒佛王像



圖2、龍門奉先寺唐高宗盧舍那佛王像



圖3、龍門擂鼓臺中洞正壁武氏倚坐彌勒佛王像



圖4、廣州光孝寺南漢西鐵塔



圖5、廣州光孝寺南漢東鐵塔



圖6、光孝寺西鐵塔倚坐彌勒佛王像



圖7、光孝寺西鐵塔手結大日如來印的盧舍那佛王像



圖8、敦煌莫329窟北壁彌勒經變圖

